



百年人生丛书

周一良 著

# 毕竟是书生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百年人生丛书

周一良 著

# 毕竟是书生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竟是书生/周一良著. -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 
1998

(百年人生丛书)

ISBN 7-5302-0514-5

I. 毕… II. 周… III. 周一良-传记 IV. K825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0072 号

毕竟是书生

BIJING SHI SHUSHENG

周一良 著

\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19 000 字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 18 001—28 000

ISBN 7-5302-0514-5

I·520 定价:13.00 元

作者照片 

周一良先生  
(曾仲鲁  
摄)





## 作者照片

下上

四十年代于波士頓公園  
四十年代哈佛大學校園內



作者照片 

下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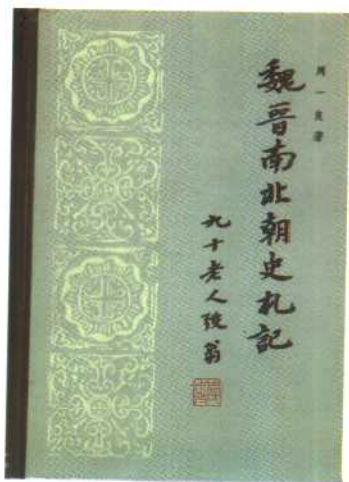
令箭荷花开了  
朗润园小荷塘畔





作者作品

周一良先生部分著作



## 目 录

- 毕竟是书生…………… (1)
- 扶桑四周…………… (100)
- 我的“《我的前半生》”…………… (121)
- 纪念陈寅恪先生…………… (129)
- 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…………… (149)
- 从《陈寅恪诗集》看陈寅恪先生…………… (160)
- 回忆两件事纪念吴晗同志…………… (169)
- 纪念杨联升教授…………… (173)
- 平生读史叹无边  
——纪念老友吴于廑…………… (187)



## 毕竟是书生

这篇自传是在纽约布朗克司执笔的。1989年6月完成初稿，1990年4月修订。其中“毕竟是书生”一节曾被日本友人译载于1991年6月号《世界》杂志。现对全文再略作订补。下限仍在1990年告一段落，因感觉自己这趟车距到达终点还有一段时间也。

1993年8月 周一良记于北大

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曾说过，为人一生总要做几件有趣味、能引人入胜的事，否则死后墓志铭都写不精彩。我现在提笔写自传，也正有此感。觉得一生平平凡凡，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，只是希望为以后编写我国20世纪中期文化、学术以至社会史的人提供一点资料。



## 一、家 世

我于1913年1月19日（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）出生于山东青岛，我名中的“良”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，“一”字是我父亲取自《说文解字》“一”字下的解说：“唯初太极，道立于一。”因而曾字太初，后废不用。虽在天津长大，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庭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，填为安徽。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，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。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，因浙江有县同名，民国后改为秋浦，又改至德。近年与东流县合并，称东至。

建德县周氏家族，据说是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周繇之后裔。我曾祖父周馥（1837—1921）字玉山，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。他青年时流亡他乡，祖父怕他不得归，改名为“复”。后因李鸿章手书保奖单误写为“馥”字，遂因而未改，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、“上达天听”了吧。《安徽文史资料》总第15辑载陈钧成撰《周馥轶事》称：“玉山老人在〔安庆〕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，兼为人代写书信、呈文、对联等。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。李鸿章亦居马王坡。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，因而认识伙房采买。其人识字不多，就近乞老人代记。李偶阅账簿，见字迹端正清秀，大加赞赏。延为幕宾，办理文牒。”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也说：“周每与人谈，辄道其生平事实，谓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。”他的自订年谱大约

讳言其事，只在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二十五岁那年记载：“十月，余至安庆。十一月，入李相国营。相国初不识余，因见余文字，招往办文案。”周馥做到署两江总督，又调任两广总督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著作收入《周恣慎公全集》。它是以溥仪小朝廷给的所谓“溢法”取名的。据陈寅恪先生《寒柳堂记梦》所说，清末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中，分所谓清流和浊流。京官如奕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，外官如周馥、杨士骧等，都属浊流。可惜陈先生这部著作散佚不全，看不到他对当时流行的这两类人物具体区别的说明。所举清流有陈宝琛、张之洞等，可能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修养的大官；而浊流则是以吏事见长的干练的大官。周馥治河有一套办法，留有著作。甲午中日战争时，他任“总理前敌营务处”，负责供应前线兵器粮饷。据他自订年谱云：“军械粮饷，转运取买，萃于一身。艰困百折，掣肘万分。然自始至终，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，故战事虽败，而将官无可推诿、卸过于余也。”大约他是按规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所以言下不无自负，虽然并无补于战争的失败。他受李鸿章重用，自然也由于办事得力。辛亥革命后，遗老群集于青岛，周馥也在其中。我父亲当时父母双亡，和祖父住在一起，这就是我出生在青岛的缘由。在我记忆中，只记得曾祖父是瘦高个儿的白发老人。因为我是在天津时他跟前最大的曾孙，每逢年节聚会，他总叫我站到他面前双膝之间。他写过一条幅，末尾说：“生日放歌一首，唯暹孙（指我父亲）尚知此意。他日一良能解文意，可为解说宝藏之。”诗中有句云：“天



有时而倾，地有时而缺，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。”显然是遗老对清室灭亡的哀叹。我父亲从未给我解说过，而“宝藏”也就到1966年史无前例时为止了。

我的祖父周学海（1856—1906），字澄之，光绪十八年壬辰（1892）进士。他曾拜李慈铭为师，见《越缦堂日记》光绪十年及十三年，说：“周氏兄弟友爱恂恂，其兄澄之尤谨笃，近日所难得也。”他长期在扬州做候补道，但兴趣似不在仕宦，而把精力用于研究医学以及撰著和校刻医书上。《清史稿·艺术传》有他的附传，说他著书“引申旧说，参以实验，多心得之言。博览群籍，实事求是，不取依托附会”，“时为人疗治，常病不异人，遇疑难，较有奇效。刻古医书十二种，所据多宋元旧槧藏家秘笈，校勘精审，世称善本云”。近年扬州根据木板重新刷印了周学海校印的《周氏医学丛书》。

曾祖父去世时我还很小，祖父更是根本不及见。若说家庭影响，主要来自父亲。我父亲周叔弢（1891—1984），原名暹字，是实业家、藏书家，去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父亲律己甚严。如他五兄弟当中，四个有侧室，甚至不止一人，他却对嫖赌鸦片丝毫不沾。对子女要求因而也比较严格，同时思想又比较开明，能随时代前进。他对我的教导，有两件事至今我印象很深。我十六七岁时，天津的时髦女子开始流行烫头发。两个来自上海的堂姐置办了火剪自己烫着玩，也给我烫了一脑袋卷毛儿。当时父亲在唐山工作，大约每月回津一次。他不知怎么得知此事，在给我的信中并未提及烫发，却插进了八个字：“人能笃实，

自有辉光。”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，至今不忘。以后一生悃悃无华，比较朴素，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。我的九个弟妹，也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，显然是父亲良好家教的结果。

另一件事是在我到燕京大学读书之后。我选了容庚教授的“《说文解字》研究”一课。原来对这门课期望甚殷，而容先生的教学方式却不涉及许书内容。每堂课由他在黑板上陆续写出楷体字，轮流唤学生上去写出篆书。实际上成为练习篆字，而不是研究《说文》。我心里很不满足，回津时向父亲谈及，不免慷慨激昂，表示要向老师提意见。父亲告诫我对老师要谦虚，老师的教法必自有其道理，不宜鲁莽从事。这件事教导了我谦虚谨慎，注意涵养，以后立身处事似乎没有违反这种精神。

父亲藏书丰富，不少善本，又喜欢搜集文物字画等等。这种嗜好与修养，使子女无形中耳濡目染，提高了文化素质。他对于子女的专业选择一概不加干涉。所以虽然“南张（謇）北周（学熙）”蜚声于旧中国实业界，父亲后来又成为他的叔父周学熙“北周”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，而他的十个子女却都从事于文史、科学、技术、教育等方面，没有一个去搞实业。我应当坦白自己的无知，在家里从未见过股票什么样。这种情况，在旧中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大家族中，也是颇为罕见的。

我的母亲姓萧名琬，祖籍云南昆明。外曾祖父萧培元，号质斋，咸丰二年（1852）进士，入翰林。曾任山东臬司，遂落户济南。外祖父萧应椿，字绍庭，清末在东北

和山东做官，善书法，精鉴赏。家庭教育大约比较开明，我曾见到母亲结婚前学习英文的练习本，中文小楷和英文字体都很秀丽端正。我出生后母亲即患急病逝世。外祖父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三千里外为尔归来，到底有汤难续命；十四年前触吾旧痛，者番垂老更伤心。”旧痛当指我大姨之死。这副对联是1989年我在华盛顿郊区谒见年逾九旬的从叔志辅先生，他告诉我的。据他说，外祖父李北海体的漂亮书法，七十多年前给他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。关于亡母我所知太少，了无印象，记此鸿爪，以寄孺慕哀思。

当时父亲年轻，悲痛之余，不知所措。他的朋友德国卫（当时用尉字，后因嫌尉字与军事有关而改）礼贤牧师（Richard Wilhelm, 1873—1930）夫妇见义勇为，把无人照看、嗷嗷待哺的新生幼婴抱回自己家，由卫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，再送回来。卫夫人晚年随长子在南京住过，我曾与她欢晤。她告诉我，在她为卫礼贤所写传记中提及此事。书名《卫礼贤——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中介》（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）。卫礼贤来华是为传播基督教，却被中国文化尤其儒家经典所感动。他取字希圣，毕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典籍，向西方宣传介绍。他译《易经》为德文，得到中国学者劳乃宣（1843—1921）的指点，理解较为确切而透彻。后又译为英文，至今为西方国家所利用，近年还曾重印。卫礼贤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（C.G.Jung）相友善，德译本《易经》曾对荣格的心理学说起过深远影响。卫礼贤回国后，20年代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中国学院，出

版刊物《中国学》(Sinica)，介绍中国文化。而在山东几十年，却没有一个中国人经过他受洗信教。卫礼贤逝世后，吴宓先生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曾有悼念文章。他的儿子卫德明(Hellmut Wilhelm)也是汉学家，曾在北大教德文，编过德华字典。我在燕京读书时有过往来。他后赴美国，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历史等，颇受爱戴，不少美国著名学者出其门下。1982年我访问西雅图，幡然二叟，共话沧桑。卫德明教授还记得，约在七十年前，他七岁那年，妈妈告诉他，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。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小小佳话吧。

父亲续娶杭州许和之，有名“许氏八乃”(许乃普、许乃钊等)之后，生了五弟：珏良(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)、艮良(天津建筑设计院副院长)、杲良(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学系教授)、以良(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教授)、治良(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)；三妹：珣良(铁道部教育处干部)、与良(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)、耦良(高中英语教师)。1925年继母许氏逝世后，又娶继母阳湖左道腴，清代名臣左辅之后，生一弟景良(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)。我是十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哥，这个表率地位与我以后“一生唯谨慎”和循规蹈矩的作风不无关系。

## 二、私塾教育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我家迁居天津。我八岁在天津入家塾读书，总共十年，1930年才赴北平求学。五四以后的青少年还这样长期读私塾，我想是和父亲当时思想分不开的。因为他最初对新式学校似乎不太信任。等到小我四五岁的二弟三弟等，便进了初中，更小的弟妹则被送进幼稚园，再由小学而中学了。20年代有些所谓“旧家”，为了让子弟在进“洋学堂”之前打下“旧学”和古文的根柢，都重视私塾教育。例如北大历史系我的同事邵循正教授和张芝联教授，都是以私塾代替小学和初中教育，然后直接进入高级中学的。不过我的例子更为极端，连高级中学都没能上，因而对以后进大学造成了局限。我的弟妹们虽然按正规进了中学，家里仍然一直聘有给他们补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老师。

十年私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头三年是三位来自扬州的职业塾师，其中有一位老先生还曾教过我的父亲、叔父、姑母等。我启蒙所读不是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以及《龙文鞭影》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，而首先是《孝经》，接着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，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。以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开蒙，这还是汉代以来的旧制呢。第二阶段四年，是跟一位年轻而我们弟兄都非常爱戴的老师学习。这位老师姓张名恣字潞雪，是杀害秋瑾



的浙江巡抚张曾敫的次子，来教我们时只二十四岁。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《礼记》和《左传》，以及姚鼐编选的《古文辞类纂》等，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。张老师循循善诱，不仅要求学生背诵，而且注意给学生讲解，亲自把《皇清经解》所收一些《左传》的注解用蝇头小字摘要抄在我的读本上。同时也给我讲《史记》、《韩非子》等，教我作桐城派古文。我对于先生讲书，总是全神贯注，非常爱听。不幸的是，在我十四岁时张先生暴病逝世，我们非常悲痛。回顾十年私塾教育，跟张先生这四年获益最多，长进最快，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先生的“束修”，最初每月五十元，后来增加到八十元，并供应早点和午饭。张先生教书认真负责，却绝无旧日私塾中严师的架子，我们弟兄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体罚。相反，先生有时还带我们出去游玩。1993年5月，偶读《大成》杂志（第232期），载有署名“榘后人”的文章《堂会忆旧》，叙述20年代天津“某公”家为其母祝寿的一次堂会戏，北京名伶毕集，戏码精彩异常。自上午十一点开始，直演到深夜一点多钟，“当时几日内，自北京驰天津的列车乘客，几乎非演员即观众。识与不识，莫不以一睹此堂会为莫大耳目之福”。文中不仅详列当天剧目，还加以说明，如称“某公精选而认为系名伶之擅长者，并坚约已退休说戏之王瑶卿出山，串演其独具特色的《得意缘》二夫人。老旦龚云甫被点演《沙桥饯别》的唐僧，此为某公示威之得意利器，因极少人知此戏系老旦应